

元代吐蕃高僧与畏兀儿的关系述论

王红梅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9)

摘要:蒙元初期,萨迦派、噶玛噶举派高僧先后来到河西地区,与当地的畏兀儿佛教徒有所接触。此后,元廷设立了通往西藏的驿站,便利了吐蕃高僧前往中原地区,也密切了其河西畏兀儿的联系。同时,大批畏兀儿人陆续迁入中原地区,逐渐由信奉大乘佛教转而皈依藏传佛教,其中有的受到蒙古贵族的信赖,充当蒙古皇室与吐蕃帝师之间的译者,有的修习喇嘛教,翻译佛典,为藏传佛教的弘传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元代;藏传佛教;畏兀儿;师徒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69(2012)03-0013-06

蒙元时期,蒙古统治者为了安抚与治理边远地区,采取各教并举、佛教独尊的宗教政策,重用吐蕃僧侣,尊崇藏传佛教。1247年,西藏萨迦四祖班智达归附蒙古,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扶持,萨迦派因此取得了西藏地区的统治地位。1270年,忽必烈敕封萨迦五祖八思巴为帝师,其后继者世袭帝师之职,统领全国佛教。忽必烈规定,历代皇帝登基前均要接受帝师的灌顶与授戒,许多皇室贵族纷纷皈依于西藏喇嘛门下。政府不惜花费巨资扶持佛教活动,促使藏传佛教得到极大的发展。

元初,蒙古统治者和蒙古贵族虽敬信藏传佛教,但由于语言的隔阂,难以直接与西藏高僧进行交流。与此同时,畏兀儿人信奉佛教由来已久,受此风气的熏染,很快接受了藏传佛教。一些畏兀儿知识分子深受蒙古统治者的器重,受命学习藏语,充当蒙古贵族与吐蕃帝师之间的翻译。还有一些畏兀儿人跟随吐蕃高僧修习喇嘛教,精通多种语言文字,用回鹘文或回鹘式蒙古文翻译藏文佛经,为传播与弘传藏传佛教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吐蕃高僧与畏兀儿的接触

高昌回鹘在成吉思汗征服中亚之初便率先

归顺,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优遇。许多畏兀儿知识分子受到重用,“回鹘最强,最先附,……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宠异冠诸国。自是,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1]元代初期,由于西北蒙古藩王的叛乱,高昌亦都护不得不东迁,建立幕府于甘肃永昌(今武威市北郊约30里处的永昌堡)^[2]。大批畏兀儿人纷纷迁居河西、中原地区。萨迦派、噶举派高僧来到内地传法之前,曾在河西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河西的畏兀儿僧团最先接触藏传佛教。而且,蒙古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吐蕃的管理,开辟了通往吐蕃的驿道。元代在河西一带沿途设立驿站,一直延伸通往吐蕃。因此吐蕃僧人往返内地,均要途经河西地区,这客观上加强了吐蕃高僧与河西畏兀儿的密切联系。

蒙元初期,萨迦派、噶举派高僧先后来到河西、蒙古以及中原地区传播佛法。他们在前往中原地区之前,都曾在河西地区生活、停留过很长时间,与当地的畏兀儿僧徒进行了接触交流。河西地区与高昌地区较早归顺蒙古,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较为发达,这为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开辟了良好的环境。

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大蒙古国所管辖。窝阔台将西夏旧地

收稿日期:2012-03-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元代畏兀儿文化研究”(08JC7700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09BZS011)。

作者简介:王红梅(1972-),女,新疆玛纳斯县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蒙元史、回鹘文文献以及西域宗教文化。

及甘青藏区划为其子阔端的份地。阔端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对当地进行了有效的管理。1244年,萨迦四祖班智达(贡噶坚赞,1180~1251年)接受蒙古王子阔端的邀请,前往内地。经过两年的艰难跋涉,1246年8月,萨班携两位侄儿八思巴与恰那多吉,抵达凉州。当时,阔端前往和林,参加贵由汗的选举大会,不在凉州。1247年初,阔端返回凉州,与萨班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据《萨迦世系史》记载:

在法王萨班到达凉州之前,阔端的身边已有几位藏族僧人,但是由于他们对佛教的知识未能精通,因此在举行祈愿法会时,由也里可温(即景教徒)和蒙古的萨满坐在僧众的上首。此后阔端和法王萨班谈论了许多教法,在原先黎域诸大德向阔端介绍佛教的基础上,使阔端明瞭佛教之教义。因此,阔端十分高兴,下令从今之后也里可温和萨满不能坐在上首,而是让萨班坐在僧众的上首。^[3]

此文中的“黎域”即今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是古藏文对此地的称谓,^[4]而“黎域诸大德”指生活于此地的畏兀儿高僧。在萨班给阔端讲解佛法之前,畏兀儿僧人已经向阔端介绍了佛教的基础知识。萨班与阔端会晤时,彼此语言不通,应是由畏兀儿人作他们的翻译。此后,萨班治愈了困扰阔端多年的顽疾,获得了他的信赖。

然后,萨班与阔端协商了西藏归顺蒙古的具体事宜,萨班给西藏各地僧俗领主写了一封公开信。尤为有趣的是,在《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信中,萨班以畏兀儿为例,劝说西藏归顺蒙古,可免遭生灵涂炭。

当今之势,此蒙古之军队多至不可胜数,窃以为瞻部洲已全部入于彼之治下。与彼同心者,则苦乐应与彼相共。彼等性情果决。故不准口称归顺而不遵彼之命令者,对此必加摧灭。畏兀儿之境未遭涂炭且较前昌盛,人民财富皆归其自有,必阍赤、库吏及别乞均由彼等自任之。……

汗王对我关切逾于他人,故汉地、吐蕃、畏兀儿、西夏等地之善知识大德及官员百姓均感奇异,前来听经,极为崇敬。无需顾虑蒙古如何对待我等来此地之众人,均甚为关

切,待之优厚。^[5]

从此信可知,萨班对高昌畏兀儿归顺蒙古的情况极为熟悉,在传法讲经时,汉地、吐蕃、畏兀儿、西夏等地的僧人均前听法,可见闻法者之众。据此推断,萨班在讲法时,有人作翻译,将他的话分别译为蒙古语、畏兀儿语、汉语和当地藏语。^[6]此后,萨班做了阔端的供养上师,在河西、蒙古等地大力弘扬佛法,也使当地的畏兀儿人接触了藏传佛教。

1251年,萨班与阔端在凉州去世,八思巴继承了其衣钵,继任萨迦五祖。1253年,八思巴在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先后为忽必烈及其子女授密教灌顶,遂留在忽必烈身边。1255年,受忽必烈之邀,前往上都,传授欢喜金刚灌顶。随后,八思巴被敕封为国师、帝师,萨迦派也得以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八思巴在任国师之前亦居住在凉州,萨迦四祖与五祖都曾长期活动于河西地区,与当地的各族僧侣有密切的交往,他们所传播的藏密对畏兀儿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另一支噶举派也在河西地区传播较早,有一定的影响力。据《贤者喜宴》载,西夏仁宗迎请噶玛噶举派都松钦巴的弟子格西藏索哇,奉其为上师。蒙元初期,都松钦巴的另一位弟子噶玛拔希也活跃在河西、蒙古地区。

公元1252年,忽必烈南征云南大理时,他亲眼目睹了噶举派在康区势力强大,噶玛拔希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便派人召请他。1253年,忽必烈与噶玛拔希会晤于绒区色堆(今川西北嘉绒地区一带)。然后,噶玛拔希应邀前往内地,曾在甘州(今甘肃张掖)略作停留,拜见了文殊菩萨。“在内地甘州之时,拜见十一面千手千臂大文殊菩萨,每一只手中持一钵,钵中有一佛。”^[7]

1255年,噶玛拔希到达忽必烈的营帐,忽必烈身边已有八思巴追随,还要噶玛拔希随侍左右。噶玛拔希未同意忽必烈的挽留而离去,前往宁夏、甘肃、内蒙等地传播佛法。公元1256年,蒙哥汗派人前来迎请他,在乌尔多宫(即上都开平)与蒙哥汗会晤。蒙哥授予他“国师”的称号,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金印及许多财宝。此后,他所流传的活佛转世系统被称为噶玛噶举派黑帽派。

1264年,噶玛拔希重获自由,获准返回西

藏。他在返回途中,行至甘肃临洮地区,将汉地、西夏、蒙古、维吾尔各族信仰佛教之僧侣召集起来,为他们讲经说法,灌顶授戒,并以严格的佛教戒律及修行次第整顿旧有的僧团。^[8]噶玛拔希经过八年的长途跋涉,于1272年,抵到当雄,1283年,在楚布寺圆寂。

吐蕃远在西陲,距离内地路途遥远,道路艰难,再加上交通工具简单。吐蕃僧人往往需要多年的跋山涉水,才能抵达内地。忽必烈即位后,为了保障八思巴能顺畅地前往吐蕃,也为了确保元廷的政令能通行无阻,仿效汉地设置驿站的惯例,决定在西藏设置驿站。忽必烈派遣官员进入吐蕃,调查沿途藏区的风土人情、物产以及道路情况,选择设置驿站的地点。

元代吐蕃至内地的交通路线大体是沿着唐朝与吐蕃王朝使臣往来通衢行进的。可能是经河州(今甘肃临夏)过黄河,溯河北岸西上,到今循化、化隆藏区,然后再继续前行。藏文史籍中提到:“从汉藏交界之处起,直至萨迦以下,总计设置了二十一个大驿站。”^[9]驿站的设置既保障了元朝中央对吐蕃地方的治理,也推动了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在《元史·释老传》中记载了西番僧人经年络绎不绝,来往频繁,滥用河西一带的驿站,给当地驿站百姓造成沉重的负担。

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僧人何事而辄佩之?”^[10]

由此可知,元代在河西一带沿途设立驿站,通往吐蕃,便利了吐蕃僧人前往内地。大批吐蕃僧人常年往来内地,虽然给当时的驿站制度造成一定的负担,但客观上促进了藏传佛教在河西畏兀儿中的传播。

二、吐蕃高僧与畏兀儿的师徒关系

有元一代,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尤为尊崇喇嘛教。自1246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晤后,确认了萨迦派在西

藏各教派中的领袖地位。^[11]忽必烈即位后,为了获得吐蕃上层僧侣的拥戴,先后敕封萨迦五祖八思巴为国师、帝师,统领全国佛教。萨迦派高僧不仅为帝后及皇室成员灌顶授戒、讲经说法,还在中原地区广泛推行喇嘛教。

在元朝,帝师享有极高的地位与礼遇,拥有各种特权,经常获得王室丰厚的供养。帝师可以自由出入宫廷,为皇室成员授戒时,皇帝、后妃、王子等按礼俗膜拜,喇嘛坐上座,听喇嘛宣讲佛法;而平时上朝时,为帝师设专席于一旁。元朝皇帝即位前,要由帝师受戒,“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12]帝师大多出自萨迦派款氏家族,但也有个别帝师不是出自款氏家族。帝师们经常给皇帝、后妃等皇室成员讲经说法,与蒙古帝王关系较为密切。因此,一些色目僧人跟随帝师学习藏密,并得以引荐给蒙古帝王。这是色目人进入仕途的一条捷径。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敕封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令其统领天下释教。因语言不通难以交流,忽必烈命迦鲁纳答思跟随国师修习藏密,学习藏语,担任八思巴与蒙古皇帝之间的译者。迦鲁纳答思(?-1311)是元代著名畏兀儿翻译家,《元史》卷一三四有其传记。迦鲁纳答思是由畏兀儿学者安藏推荐给世祖,因其聪慧,精通多种语言,深得世祖信赖,充当国师与皇帝之间的译者。《元史·迦鲁纳答思传》载:

迦鲁纳答思,畏兀儿人,通天竺教及诸国语。翰林学士安藏札牙答思荐于世祖,召入朝,命与国师讲法。国师西蕃人,言语不相通。帝因命迦鲁纳答思从国师习其法,及言与字,期年皆通。以畏兀字译西天、西蕃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镌版,赐诸王大臣。^[13]

此处的西蕃国师应是八思巴,迦鲁纳答思就是八思巴的弟子。世祖时,迦鲁纳答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并受命任成宗帖木儿的老师,以佛教戒律进行劝诫。至元二十二年(1285)春至二十四年(1287),元廷曾对《大藏经》进行了一次整理工作,主要是以藏文佛经勘对汉文佛经,定名为《至元法宝堪同总录》。参见此勘对工作的有29位汉、藏、印度、畏兀儿等族的高僧,其

中畏兀儿人有5位,由迦鲁纳答思领衔主持。

1.北庭都护府通二国言音、解显密教迦鲁拏答思奉诏译西番语;

2.翰林学士、嘉议大夫脱印都统奉诏译畏兀儿语;

3.翰林学士承旨、正奉大夫安藏奉诏译语证义;

4.资德大夫释教都总统正宗弘教大师合台萨理奉诏译语证义;

5.北庭都护府通显密教讲经论律沙门斋牙答思奉诏证西天语。

迦鲁纳答思奉诏译西番语,可见其语言功底深厚。他精通畏兀儿、蒙古、藏文及梵语等语言文字,元成宗时,受封为大司徒,在大都白塔寺专门翻译佛经。他翻译了多部梵文、藏文重要佛典,并受命刻板发行,颁赐给王公大臣学习。近代,在吐鲁番出土的木刻本《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的回鹘文译本就是出自迦鲁纳答思之手。^[14]

1270年,萨迦五祖八思巴因创制蒙古新字有功,敕封为“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其封号全称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简称帝师。八思巴在元朝享有崇高的地位,广收门徒。他的弟子中既有蒙古帝后、勋贵,也有各族虔诚的佛教徒,其中就有不少畏兀儿人。而且,八思巴一生收徒众多,曾为四千余人授戒剃度,为425人担任过授戒的堪布,其中有一些精通藏语的畏兀儿佛教徒。

据元代史籍记载,畏兀儿人阿鲁浑萨理受教于帝师八思巴,通晓畏兀儿、蒙、汉、藏多种语言。阿鲁浑萨理出自畏兀儿佛教世家,官至尚书右丞、中书平章政事,位高权重,死后被迫封为赵国公。《元史》载,“阿鲁浑萨理其中子也,以父字为全氏,幼聪慧,受业于国师八哈思巴,即通其学,且解诸国语。世祖闻其材,俾习中国之学,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15]

这里的国师八哈思巴即八思巴,阿鲁浑萨理少年时,跟随母亲来到中原,就师从“国师”八思巴学习。1264年,八思巴奉命返回西藏时,阿鲁浑萨理跟随他同行,游历了西藏地区。八思巴回到大都后,又将他推荐给忽必烈。元代书画家赵

孟頫在《全公神道碑铭》中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

公从国师八思马学浮屠法,不数月,尽通其书,旁达诸国及汉语。……顷之,遂通诸经、史、百家,若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靡不精诣。会国师西还,携与俱。岁除,乞归省,师送之曰:“以汝之学,非为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拜耶?勉事圣君。”相泣而别。比至阙,师已上书荐之,裕宗得召入宿卫,日以笔札侍左右。^[16]

阿鲁浑萨理跟随帝师学习藏密及藏语,受到八思巴的器重,荐之于朝廷,担任中书省平章政事、集贤学士、太史院事等官。而且,阿鲁浑萨理家族世代信奉佛教,据《元史·阿鲁浑萨理传》载,其祖阿台萨理“精佛氏学”,其父“乞台萨理,袭先业,通经、律、论。业既成,师名之曰万全。至元十二年(1275),入为释教都总统,拜正议大夫、同知总制院事。”

众所周知,总制院设立于忽必烈执政初期,“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17]它是宣政院的前身,当初是由帝师八思巴兼领的。至元十一年(1274)八思巴再次返回故乡时,其职掌继由萨迦派喇嘛所执掌。此时,乞台萨理能出任总制院辖下的释教都总统和同知总制院事,说明他在西藏佛教界有着较大的影响,深得八思巴赏识。因为按惯例,这两个职务通常是由帝师提名、举荐的。其子阿鲁浑萨理有缘师从八思巴,也从侧面反映了该家族与萨迦派的关系非同寻常。

据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藏密文献,畏兀儿翻译家本雅失里(Punyaśrī)也是元朝帝师八思巴的弟子。本雅失里依据藏文本,翻译了密宗经典《吉祥胜乐轮曼陀罗》。^[18]《吉祥胜乐轮》是藏传密教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本续,早在西夏时代就传入汉地。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一些有关这部本续的西夏文和汉文文献。在回鹘文《吉祥胜乐轮曼陀罗》写本第23页中,译者罗列了自金刚手以下23位上师的名字,其中最后一位为八思巴上师,并写到:“paṇḍita baxši-niṅg yang-ta körüp mn puny-a-śiri ävīrtim”(我本雅失里在八思巴上师的仪轨上看到这些,并做了翻译)。^[19]由此可知,本雅失里应是八思巴的亲传弟子,与其关系密切。他还翻译了密宗经典《身轮因明经》(梵文作 Kāya-cakra Sūdhana,藏文作 Lus-dkyil-gyi bdag-'jug),

原本为献给萨迦五祖八思巴的著作,见载于《萨迦五祖全集》第6卷,内容与《吉祥胜乐轮曼陀罗》有关,意在阐述吉祥轮律之法旨。回鹘文写本《身轮因明经》与《吉祥胜乐轮曼陀罗》合为一册,1902至1903年间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考察时所发现,现存德国国家图书馆。

元代的帝师与国师多为来自吐蕃的藏族高僧,其他民族的僧人受封为国师者寥寥无几。在元朝中期就曾出现了一位畏兀儿国师。必兰纳识理(?-1332年)授戒于第五代帝师,晚年被加封为“三藏国师”,在《元史·释老传》、《补续高僧传·译经篇》中有其传记。必兰纳识里精通畏兀儿、蒙古、藏、汉文等多种语言文字,根据《元史·释老传》记载,他曾用回鹘式蒙古文翻译了六、七部佛教经典。而且,在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教诗集残卷中,亦保留了他所创作的回鹘文佛教赞美诗。他先后历仕六朝,早年受戒于帝师,代成宗铁穆耳出家修行,晚年由英宗加封为“三藏国师”,地位仅次于帝师。^[20]

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必兰纳识里“奉旨从帝师受戒于广寒殿”。元成宗时,帝师已传至第五代,由乞刺斯八斡节儿担任。乞刺斯八斡节儿亲自为他授戒灌顶,传授藏密修行方法。元成宗亲自为他赐名,“必兰纳识理者”系梵文 Prajñāsī 之音译,意为“慧吉祥”。^[21]第五代帝师乞刺斯八斡节儿(扎巴俄色,1255-1303年),或译作吃刺思八斡节儿,不属萨迦款氏家族。据《红史》载,他曾任八思巴的侍从却本,后来作为达玛巴拉的随从到朝廷。《萨迦世系史》提到,八思巴去世后,因畏惧皇帝降罪,萨迦派无人敢去朝廷报丧,他自荐而往,被任命为帝师。据《元史·释老传》载:“亦摄思连真嗣,三十一年卒。乞刺斯八斡节儿嗣。”《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一》载,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六月“以合刺思八斡节儿为帝师。”1294年,乞刺斯八斡节儿继任帝师职位。元贞元年(1295年)二月,成宗赐给他一顶宝玉五方佛冠、一方双龙盘纽白玉印,玉印上刻有“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他还两次提出赦免死囚、赈济鳏寡贫民的建议,都为成宗欣然采纳,可见成宗对他极为敬重。大德七年(1303年)他在大都去世,任帝师仅9年,享年58岁。

必兰纳识理由于得到帝师的受戒,再加之精

通多种语言,从大德六年(1302年)身为替僧,直到至顺二年(1331年),受封国师,仕途较为顺遂,官职节节攀升。仁宗时,他负责翻译番国朝贡的表章文字,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赐三台银印。英宗时,负责引进各国来朝贡的使臣;至治三年(1323年),升为诸国引进使,特授沙津爱护持(汉译总统),并赐予金印。至顺二年,文宗加封他为“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赐予玉印。必兰纳识里受封国师,已达到了其仕途的顶峰,皇帝、皇后以及太子可以聆听其讲法,而且王公大臣也会前往受戒于国师。

舍蓝蓝是史籍中惟一有载的畏兀儿女喇嘛,也授戒于帝师。舍蓝蓝祖籍高昌,为避海都之乱举家内迁,入侍后宫,颇受厚宠,曾拜帝师迦罗斯巴斡即儿为师。舍蓝蓝出家为尼后,仍住于宫中,为后妃们讲经说法。其事迹见于《佛祖历代通载》卷22:

舍蓝蓝,高昌人,其地隶北庭。其地好佛,故为苾刍者多……海都之叛,国人南徙。师始八岁,从其亲至京师。入侍中宫真懿顺圣皇后……诏礼帝师迦罗斯巴斡即儿为师。雉发为尼,服用之物,皆取给于官……内而妃主,外而王公,皆敬以师礼,称曰八哈石。北人之称八哈石,犹汉人之称师也。

《佛祖历代通载》所载帝师迦罗斯巴斡即儿应为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在《元史·释老传》中写作乞刺斯斡节儿。他在成宗朝担任帝师,颇受成宗的信赖与礼遇。元代史籍中对吐蕃僧人的译名多有出入,不同史书中对同一人的译名会略有差异。在元代帝师中,扎巴俄色的藏文名字为 grags pav od zer,又译作“乞刺斯斡节儿”,按照元代对藏文的拼写方法,容易被译为迦罗斯巴斡即儿。^[22]

舍蓝蓝曾为武宗、仁宗之师,王公贵族对她都十分敬重。仁宗时,舍蓝蓝以年老专事佛法为辞,搬到宫外居住。她用所得赏赐修建资助佛寺,潜心修行,缮写佛经。“……诏居妙善寺……以黄金缮写番字藏经《般若八千颂》、《五护陀罗尼》十余部及汉字《华严》、《楞严》,畏兀字《法华》、《金光明》等经二部。又于西山重修龙泉寺,建层阁于莲池。于吐蕃五大寺、高昌国旃檀佛寺、京师万安寺等,皆贮钞币,以给燃灯续明之

费。又制僧伽黎文数百,施番汉诸国之僧。其书写佛经,用金数万两,并寺施舍所用币数以万计。”她常年集巨资供奉佛寺,积累无数功德,颇受爱戴,甚至英宗、明宗也以师礼待之。至顺三年(1332)二月二十一日去世,时年64岁,葬于南城之阳,赐号“真净妙惠大师”。

除了上述之外,畏兀儿佛教徒中与吐蕃高僧关系密切者还有很多。有的在宣政院任职,与藏

族僧人共事;有的受戒于西藏帝师,代蒙古皇帝出家,成为皇帝的替僧;也有的作为高级僧官,参与对全国佛教的管理;有的受到蒙古贵族的信赖,充当蒙古皇室与吐蕃帝师之间的译者,更多的则是从事于翻译工作,将藏传佛教的经典翻译成回鹘文或蒙古文,为藏传佛教的弘传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M].大正藏:卷四九,第2036号:727c.
- [2]贾丛江.元代畏兀儿迁居永昌事辑[J].西域研究,2002,(4):16~25.
- [1][4][5]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译.萨迦世系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95,114,102~106.
- [6]杨雄.敦煌藏传密教艺术的珍贵遗存——莫高窟第四六五窟附榆林窟第四窟的内容与形式[A].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五窟(元)[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15.
- [7]蔡巴·贡嘎多吉著、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79~80.
- [8]周润年.十三世纪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高僧——噶玛拔希[J].西藏研究,1997,(2):56.
- [9]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68.
- [10](明)宋濂.元史·释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卷202:4522.
- [11]樊保良、水天长主编.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84.
- [12](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20.
- [13](明)宋濂.元史·迦鲁纳答思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卷134:3260~3261.
- [14]P.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TT,Berlin,1985:178~179.
- [11](明)宋濂.元史·阿鲁浑萨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卷130:3175.
- [12]赵孟頫.全公神道碑铭[A].松雪斋文集:卷七[C].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 [17](明)宋濂.元史·桑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卷20:4570.
- [18]杨富学.回鹘之佛教[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38.
- [19]G. Kara und P. Zieme, 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 Berliner Turfan-Texte VII), Berlin 1976:46.
- [20][21]王红梅.元代畏兀儿高僧必兰纳识里考[J].宗教学研究,2011,(3):173.
- [22]朱丽霞.白马寺与元朝帝师关系述略[J].西藏研究,2008,(2):63.

(责任编辑:代琴)